

晚清中國對日本人授勳史實之考察

——以獲得雙龍寶星的石黑忠憲和柴五郎為例

王 君 強

Investigate historical fact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confer Japanese the medal

——Take Ishiguro tadanori and Shiba gorou as an example

WANG junqia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produced the medal constitution. The medal is a product by the Eastward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to break the original system of the canonization of East Asia. Especially for foreigners medals, It has positive significance and function in modern history. The medal system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was created in its communication with the outside world in order to reward the foreigners with a fine record of service to China. The system consisted of eleven ranks in five grades. Later on, it was applied to Japanese people, thus blending with the medal systems of other countries

Keywords: Medal system, Late Qing Dynasty, Ishiguro tadanori, Shiba gorou

一、晚清寶星勳章制度的形成

1.1 晚清寶星的產生及其背景

勳章是西歐獎賞制度形式的一種。而在中國，勳章形成於清末，與晚清外交禮儀的改革有著緊密的關係。在中國古代沒有現實的外交活動。沒有實際意義上的可以與皇帝地位平等的外國君主。

而在西歐，17世紀後歐洲各國之間互相派遣使節已然成為了慣例。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後，歐洲對主權外交，商業往來等做了詳細的制定。使其與當時國際法同步，體現國家間的平等交往。隨著各國勳章制度的完善，各國君主之間互贈即勳章，對別國派駐的使節及隨員賞以勳章，也成為國家間平等友好交往的象徵。

清朝作為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基本上繼承了明以前王朝的政治制度，同時又保留著許多自己民族的特點。清統治者認為明代“分封而不賜土，列爵而不臨民，食祿而不治事”是長治久安的良策，因而沿襲其“封而不建”的原則。同時，將明代表面上存在的郡國形式也取消了，僅給諸王以封爵的美名，不予封

土。由於清代諸王爵無“國”可就，因此，諸王在分府後，只能在京城建邸。

清王朝沿襲前代舊制，將禮部作為外事主管機構，而且在華夏中心意識的支配下，外交事務等同於朝貢事務。清初，外事管理分隸禮部主客司、會同館和翰林院所屬四譯館。這一管理體制至乾隆年間發生兩個變化：一是將會同館、四譯館合並，隸屬禮部；二是主客司的一部分職權轉歸內務府。除此之外，從中央到地方，皆有官衙參與外事管理。

禮部的主要職責一是查驗朝貢國是否符合既定的朝貢程序，按規定的貢道、貢期、貢物前來朝貢。二是主持或參與對朝貢國的封賞活動。三是負責貢使來京後的接待、供應、宴饗、覲見、貿易等事宜。

順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康熙帝即位後，清朝統治者認為：理藩院專管外藩事務，責任重大，“今作禮部所屬，於舊制未合。嗣後不必兼禮部銜，仍稱理藩院尚書、侍郎，其印文亦著改正鑄給”¹⁾

直至近世，馬戛爾尼使團於1793年8月到達天津，在天津逗留期間，馬戛爾尼等與清廷官員之間來往多採用西方禮節，衝突在覲見之前發生，馬戛爾尼只同意單膝跪地而拒絕三跪九叩大禮，清廷高級官員與其進行了長時間交涉談判，最後互相妥協，馬戛爾尼得以覲見乾隆帝。直到鴉片戰爭之後，西方用堅船利炮迫使清廷屈服，中外交往禮儀開始向西方靠近。

與日本幕末同樣為閉關鎖國的清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時被西歐列強撬開了國門。開始了認知世界。隨著西歐人開始湧入了清國，理藩院辦事效率已不能滿足歐洲人與清國交往的相關事宜。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清國簽訂了《北京條約》，西歐列國希望清國設立專門負責外交事務的機構。且對外交涉事物增多。至此，在恭親王奕訢，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共同上奏懇請之下，清國於1862年成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總理衙門主管外交及外交禮儀，鴉片戰爭後，清國與各國的外交愈發頻繁，而在頻繁的外務交涉中，一些禮儀及習俗發生了摩擦與碰撞。而寶星制度也是在這種摩擦中形成。晚清時期，大量外國人在清國被聘用於軍工，教育，經濟等諸多行業。而為了表彰有功的外國人，清廷最早想到的是頂戴花翎的獎賞。但頂戴花翎並不能使所有的有功外國人感到滿足。另一方面，當時駐外官員在國外考察，辦公，禮節性訪問的時候，西歐列國會按照自己的傳統頒發勳章給清國人。而清國人多會回贈頂戴花翎。但頂戴花翎卻無法讓外國人佩戴。清國為與西方制度接軌，於是寶星制度應運而生。

1.2 寶星勳章的初現

1856年，太平天國達到極盛，而與此同時，英國正在積極醞釀第二次鴉片戰爭以獲取更多的權利，清廷可謂內外皆患，中國社會矛盾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複雜局勢。1860年，太平軍逼近上海，為避免上海的“淪陷”，蘇松太道吳煦聘用美國人華爾組建的洋槍隊來對抗太平軍。清廷為鼓勵其士氣，多次對其進行獎賞，如華爾從四品一路升作從二品副將，為借得洋人之力以消滅“心腹之患”，清廷對其物質賞賜甚豐，戈登甚至得到過一萬兩白銀的賞賜。1862年12月，李鴻章奏請獎賞克復嘉定縣城之中外兵弁，“英國水師提督何伯、陸路提督士迪佛立、翻譯官阿查理，法國水師提督伏恭等”，由於官職較大，不適宜功牌獎賞，即由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兩國駐京公使回奏該國，酌給議敘，以示我朝行賞論功，中外一體之至意”，

1) 《清圣祖实录》卷二，順治十八年三月戊寅。

即請英法兩國自行獎賞。而其餘的兩國出力員弁，則由

“會防局仿照該國功牌式樣，另鑄金銀等牌若干面，分別酌給佩戴”。²⁾

李鴻章所謂“該國功牌式樣”應為外國的勳章。這裏的“金銀牌若干面”，可視為清代寶星的雛形。中國功牌為“督、撫及統兵官頒給屬下的獎牌”相對來說榮譽地位不及西方勳章之尊，李鴻章此時不了解西方的功勳榮譽制度，將寶星與功牌等同，也沒有強調西方對寶星得到重視及此種做法的重要性，既降低了寶星的榮譽地位，也沒有引起清廷特別的重視。1863年3月，在天津練兵的英國人瑞克斯帶領所練兵勇在津郡鎮壓當地農民起義卓有成效，時任直隸總督崇厚奏請賞給瑞克斯銀功牌，恭親王奕訢認為此舉不妥，建議崇厚奏請照會該國使館，由英國自行酌情議敘。但不久崇厚即致函恭親王告知該員情願只領功牌，恭親王只得同意並上奏，崇厚的奏請得以順利實現。此時，賞給出力洋將金銀功牌的做法並沒有得到廣泛認同，清廷仍在通過厚賜物品以籠絡洋員。但這不是長久之計，清廷在給左宗棠的聖諭中說：對洋員的獎賞：

“若賞給銀兩，恐以戈登為比，實難為繼。若賞給物件過優，恐戈登又有藉口……若由內府頒賜奇珍，恐褻國體，從前並無辦過成案。”³⁾

然洋將對功牌的重視給了崇厚以信心，為將此類金銀功牌獎賞得到清廷高層的重視，崇厚下了一番功夫。在取得總理衙門的支持下，他以外國寶星為基礎，參照中國功牌獎賞，積極制定了相對完整的改鑄方案。至此，寶星獎賞得到了官方承認，有了初步的等級劃分和紋飾、獎賞對象，有了自己的專有名稱，稱金寶星（又稱金功牌），向寶星制度的形成邁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1.3 《獎給洋員雙龍寶星章程》的頒布與改進

寶星獎賞制度尚未明文規定予以頒佈，清廷與西方達成協議實施“中外會防”“借師助剿”的情況下，對“助剿”有功之洋人該如何進行獎賞，成為令其頭疼的一件事。這從清廷給左宗棠的上諭中可見一斑。1863年11月，左宗棠奏請獎賞協助克復寧波等府縣出力人員英國領事夏福禮、法國參將權授中國總兵官德克碑等，清廷回復說：

“各國助剿出力獎勵，有僅傳旨嘉獎者，有行知該國主自行給獎者，有賞銀牌者，有賞銀兩者，其功績大小不同故獎賞亦厚薄有別。日前李鴻章奏克復蘇州省城，戈登尤為出力，曾經降旨賞給頭等功牌並銀一萬兩……浙省助剿之英、法領事等官夏福禮等九員，協同克復寧波、慈溪等城，甚為出力，惟究非克省可比，若賞給銀兩，恐以戈登為比，實難為繼；若給物件過優，恐戈登又有藉口。緣日前陣亡之勒布樂東，曾賞貂皮，英國駐京公使曾援以為戈登請，經總理衙門告之系因陣亡而賞，戈登實非其比，是以重賞銀兩，該使亦即終止。左宗棠所請傳旨賞給該員等物件，是否已有成說？惟未明言何

2) 吳汝綸《李文忠公全集·奏稿二》文海出版社 第95頁

3) 左宗棠撰《左宗棠全集·奏稿一》嶽麓書社 1987年版 第269頁

項賞件，礙難懸擬。”⁴⁾

李鴻章和崇厚先後提出的金銀牌獎賞辦法，給了清廷以新的思路，加之恭親王奕訢的支持，清廷意識到外國人對功牌的重視，開始計畫由功牌向寶星之轉變。左宗棠再次奏請獎賞助剿出力外國員弁時，清廷即發上諭指示左宗棠相機辦理：

“功牌為外人所重，無論或賞銀兩，或賞物件，均不可無功牌。功牌如外國寶星之類，崇厚、李鴻章並曾製造有式，可仿照辦理也。”⁵⁾

1865年初，李鴻章奏請獎賞助剿出力之常勝軍官弁，推動了寶星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在清單中列出了明確的寶星獎賞等級。寶星獎賞已得到了清廷部分高級官員的認同，初步形成較為清晰的等級，能較為公平的根據本人功績大小來進行獎賞。

1877年中國正式實行駐外使館制度後，寶星在外交上也開始發揮重要作用。此時初級寶星制度已向全國推行開來，但在中外遣使往來日益頻繁的情況下，專門用來獎賞軍功的寶星制度顯然不適合用於贈送外國公使人員，這種不適最終推動了涵蓋面更廣的正式寶星章程的頒佈。洋務運動促使清廷與西方各國擴大了合作，為方便與洋匠及外國外交人員往來，制定頒佈正式的寶星制度勢在必行。1881年中俄條約修訂完成後，根據國際慣例，清廷應賞給各國駐京大臣以寶星，這一事實直接推動了寶星章程的頒佈。1882年1月（光緒七年十二月），總署上疏朝廷，奏請頒佈其參閱西法而製成的《獎給洋員寶星章程》，不久即得到了批准。奏摺及章程原文如下：

“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奕訢等奏，為厘定寶星章程請旨遵行以昭慎重事，竊臣等奏請奏請賞給英國使臣威妥瑪等寶星摺內聲明再由臣等厘定等第，酌擬章程，奏明奉旨後製造頒給等因。查泰西各國行用寶星，大抵視品級之崇卑定禮文之隆殺，約言其制則有四：

一曰名目。各國張掛旗幟制度各有不同，中國之旗幟向例以繪畫龍紋為識，

現擬仿照此例，於寶星之上嵌以雙龍，即命之曰雙龍寶星。自頭等第三一，皆於上面嵌‘大清禦賜’四字，其頭等第一第二系特表優異之典，不得率行濫請。

一曰等第。各國之寶星有為國君自行佩戴因贈予與國之君者，有頒賜臣下而

而推及於與國之臣下者，分際迥殊，等威不一。現擬將寶星分列五等，並於頭二三等中每等再分三級，計次序之數共十有一。即於寶星上鑿刻清文注明等第字樣，自國君以至於工商人等各如其品以相酬，庶名器不至濫邀，而更免畸重畸輕之弊。

一曰藻飾。我朝之有品級定例綦嚴，故上自王公下及生監，向以頂戴別尊卑，

現擬參用此意，於寶星上鑲嵌珠寶一顆，分其顏色以示區別。

一曰執照。各國每遇發給寶星之時，除應行之文書外，另備執照一紙給本人

4) 《左宗棠全集·奏稿一》嶽麓書社 1987年版 第270頁

5) 《左宗棠全集·奏稿一》嶽麓書社 1987年版 第270頁

收執以為憑。現擬於寶星執照內前半恭錄允准厘定寶星之諭旨，後半填寫承領執照之人姓名籍貫，敘明因何給予之故暨給予之年、月、日。其頭等第一第二未便加用執照，應由臣衙門知照各國外部大臣，分別轉贈移送，其頭等第三以下應用知照，則蓋用臣衙門關防。此後本人若由劣跡，經本國斥退者，仍將寶星執照一律追繳。其餘尺寸之大小，絲帶之短長，亦隨等第以判低昂。

以上所擬各條，考之各國崇尚寶星之例，立法雖異，立意則同，要皆因時制宜，以期折中至當，謹開單繪圖，恭承禦覽。嗣後凡遇頒賞頭二等寶星，奉旨後均由臣衙門製造頒給。其三等以下寶星，何處奏請頒賞即由何處照式製造頒給，蓋用關防發給執照以備稽核”⁶⁾

寶星等第具體分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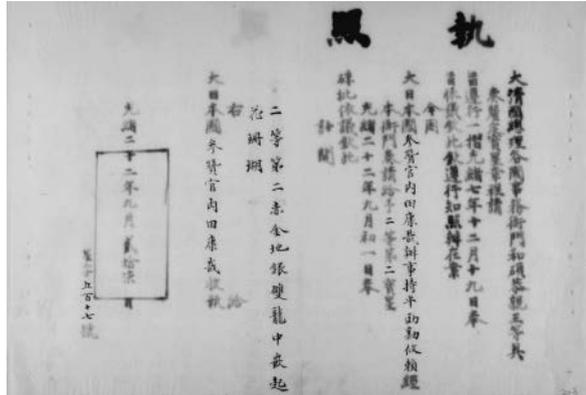
等第	頒發對象	外觀細則	尺寸
頭等第一	專贈各國之君	赤金地法藍雙龍，中嵌珍珠、金龍，金紅色帶；	寶星式尚方計營造，尺長三寸三分，寬二寸二分，帶均長一尺三寸，寬一寸五分，兩頭有穗，絲繩束結
頭等第二	給各國世子親王宗親國戚等	赤金地法藍雙龍，中嵌紅寶石	寶星式尚方計營造，尺長三寸三分，寬二寸二分，帶均長一尺三寸，寬一寸五分，兩頭有穗，絲繩束結
頭等第三	給各國世爵大臣、總理各部大臣、頭等公使等	赤金地法藍雙龍，中嵌光面珊瑚，俱銀龍，大紅色帶。	寶星式尚方計營造，尺長三寸三分，寬二寸二分，帶均長一尺三寸，寬一寸五分，兩頭有穗，絲繩束結
二等第一	給各國二等公使等	赤金地銀雙龍，中嵌起花珊瑚，黃龍，紫色帶	寶星式尚圓徑二寸七分，帶均長一尺三寸，寬一寸五分，兩頭有穗，絲繩束結
二等第二	給各國三等公使、署理公使、總稅務司等	赤金地銀雙龍，中嵌起花珊瑚，黃龍，紫色帶	寶星式尚圓徑二寸七分，帶均長一尺三寸，寬一寸五分，兩頭有穗，絲繩束結
二等第三	給各國頭等參贊、武職大員、總領事官、總教習等	赤金地銀雙龍，中嵌起花珊瑚，黃龍，紫色帶	寶星式尚圓徑二寸七分，帶均長一尺三寸，寬一寸五分，兩頭有穗，絲繩束結
三等第一	給各國二三等參贊、領事官、正使隨員、水師頭等管駕官、陸路副將教習等	法藍地金雙龍，中嵌藍寶石，紅龍，藍色帶	寶星式尚圓徑二寸五分，帶長一尺三寸，寬一寸五分
三等第二	給各國副領事官、水師二等管駕官、陸路參將等	法藍地金雙龍，中嵌藍寶石，紅龍，藍色帶	寶星式尚圓徑二寸五分，帶長一尺三寸，寬一寸五分
三等第三	給各國翻譯官、遊擊都司等	法藍地金雙龍，中嵌藍寶石，紅龍，藍色帶	寶星式尚圓徑二寸五分，帶長一尺三寸，寬一寸五分
四等	給各國兵弁等	法藍地銀雙龍，中嵌青金，綠龍，醬紫色帶	寶星式尚圓徑一寸九分，帶均長五寸，寬一寸一分
五等	給各國工商人等	銀地法藍龍，中嵌碑磬，藍龍，月白帶	寶星式尚圓徑一寸六分，帶均長五寸，寬一寸一分

(據恭親王奕訢光緒七年《總署奏厘定獎給洋員寶星章程奏折》製表)

從上引文中可看出，總署所奏寶星章程內詳細列明瞭寶星名稱與等級、藻飾與式樣、執照與獎賞對象以及製造頒給程式等，說明寶星獎賞業已形成了比較完備的制度，使用範圍上至各國君主，下至各國工商人等，只要做出了對中國有益的事情（或期望其能對中國做出有益的事情），不管其是否來到過中國，都可以得到清廷贈送或獎賞的寶星，而不再局限於受聘人是將士或工匠，具有了較濃厚的外交色彩。但此時的

6) 王彥威等：《清季外交史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版，卷二十六，總第518頁

寶星總體式樣



(圖一：大清國頒發勳章執照樣式)

上仍沒有擺脫功牌的影響。清廷賞給洋員寶星時，一般先由有關大臣申請，據實陳奏其所屬洋員的貢獻，經總理衙門核實，報予最高統治者批准後，即照會其所在國駐京使館，表明獎賞寶星之意。關於照會及執照內容，如上圖所示：

可以看出明確及詳細的授予信息，晚清頒發雙龍寶星的同時一定會有執照作為憑證，執照中詳細的記載了頒發的機關：大清國總理各國事物衙門，及頒發的時間，還記載了授予的寶星的等級和具體的樣式。還有人物姓名及緣由。

而在晚清時期清國授予給日本國寶星的史實中有兩位不可忽視的人物，醫治李鴻章的石黑忠憲及保衛紫禁城的柴五郎，而清國為什麼會授予寶星給這兩位日本人呢？授予寶星之前，這兩位日本人做了哪些事呢？接下來進行史實的考察和分析。

二、1895年獲二等第二雙龍寶星的石黑忠憲

2.1 遇刺前的李鴻章在下關的行動

石黑忠憲（1845年3月18日-1941年4月26日）是日本明治時代的日本陸軍軍醫。乳名庸太郎。父親平野順作良忠是幕府時期代官的下級官員。因為父母早亡，忠憲跟隨嫁到越後國三島郡片貝村（今新潟縣小千穀市）的姑姑來到石黑家，成為了石黑家的養子。因受到佐久間象山的鼓勵，到江戶求學醫學，畢業後成為了醫學所的斷句師。幕府被推翻之後，在醫學所改制之後的大東學校（東京大學醫學部前身）就職。1871年進入兵部省，成為了一名軍醫。⁷⁾

1895年3月19日（西曆），全權大臣李鴻章、全權大臣參議李經方、參贊伍廷芳等到達日本門司港，從20日開始在春帆樓進行談判。

李鴻章一行乘船抵達日本馬關，拉開了後來史稱“馬關議和”的中日談判的序幕。

在春帆樓，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與外務大臣陸奧，與中國代表相互交換全權證書。相互演看之後，陸說：“日皇敕書是否妥協？”。李說：“甚妥。我國敕書是否妥協？”伊說：“以此敕書甚妥。”然後中

7) 石黑忠憲《石黑忠憲 懷舊九十年》大空社 解說第2頁



（圖二：石黑忠憲圖像。出自博文館（Hakubunkan）- 雜誌『太陽（The Sun）』第3卷第21号、口繪）

國代表把要求停戰的英文節略面交伊藤。伊藤“略思”片刻，答明日回復。第一次談判，就以見面確認資格文書結束了。⁸⁾

次日，中日雙方全權大臣開始了第二次談判。日本終於亮出底牌，李鴻章要求休戰；而伊藤以軍方強烈反對休戰為由，提出休戰條件是讓日本軍隊佔領尚沒有進行戰爭、日本軍隊也還沒有侵入的天津大沽、天津、山海關，要那裏的中國軍隊解除武裝。同時要中國交出天津、山海關的鐵路，休戰期間中國方面負擔日軍的軍費。

看到日本提出的休戰條件太無理，李鴻章要求擱置休戰談判，先看看日本提出什麼樣的媾和條件。伊藤威脅李鴻章道，一旦提出了休戰條件，開始審議而又中止的話，今後就不能再提此問題。李鴻章要求給三天時間，三天之後再開始談判。

談判沒有結果，李鴻章散會後立刻將上述內容電告總理衙門。他本人的意見：“要脅過甚，礙難允行。”⁹⁾

2.2 小山豐太郎刺殺李鴻章的過程

三天後，第三次談判於24日開始。談判結束後，李鴻章離開春帆樓，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李鴻章坐上了歸途的轎子。

從談判會場春帆樓到李鴻章下榻的引接寺這短短的幾步路，當地的居民蜂擁而來，在路旁築成一道長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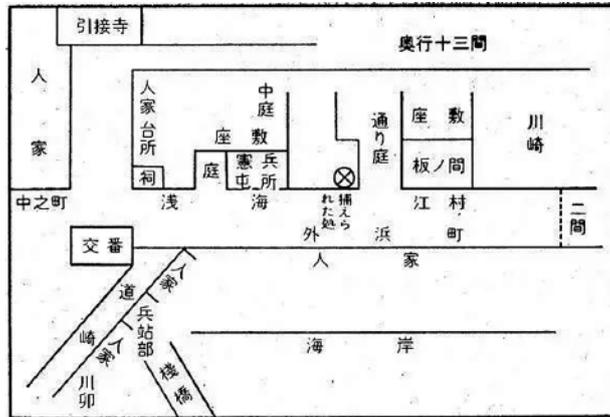
一名目擊者回憶：

“我想那是下午四時三十分。那天是星期日，天氣和煦晴朗，櫻花將開未開，是個好日子。出門的人也很多，到處都是人擠人。李鴻章還是乘著那頂轎子，正在經過我家門前拐角的一剎那，從路右邊的人群中躡出一名二十三四歲的男子，左手按住轎子，右手掏出手槍，從李全權的右側向其面部開了一

8) 顧延龍 葉亞廉《李鴻章全集》顧延龍 葉亞廉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年

9) 顧延龍 葉亞廉《李鴻章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年466頁

槍。負傷的李氏立即以右手的長袖掩住傷口，毫無震驚的神色，態度泰然自若。目睹这一幕的我感歎，真不愧是了不起的人物。”¹⁰⁾



(圖三：李鴻章遇刺地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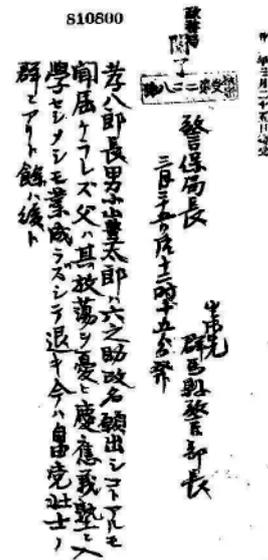
本來，由於李鴻章的到來，馬關市政當加強了地方治安。當時日本報紙這樣報導：

陸上五步一巡查¹¹⁾，十步一憲兵，四處掃視有無可疑者。海上亦有員警旗翻飛之小艇到處出沒，水上警戒亦臻於完備。如此嚴格，乃為防止兩國全權大臣有不測。為看李鴻章一眼而雲集馬關之眾人中，紅衫漢¹²⁾尤多。巡查一一往來盤問，調查無旅券者，其狀甚為森嚴。¹³⁾

當晚，伊藤博文發電報給內務大臣野村靖，要求調查刺客的身份。小山六之助，原名豐太郎，現年27歲，群馬縣平民，其父孝八郎曾任縣議會議員等職。他是家中長子，但因為為人“放蕩無賴”，七年前就被父親廢除了嫡子身份。小學畢業後，他念了幾個月中學便即退學，後進入慶應義塾就讀，亦中途退學。之後一直沒有固定工作，曾為自由黨的選舉活動賣力，屬於所謂的“壯士”¹⁴⁾之流，有兩次因打人毀物入獄。

被捕後，小山豐太郎如是說：

“支那人多半似乎有著對世界之大勢 毫不介意的大國民神氣。視朝鮮為屬國，視日本為小國，唯獨自誇為世界之大國。。。中略。。。已垂一年的日清戰爭，就這樣意外告終的話，遺憾與惋惜實在是難以言表。在他們思考的時候，只要再加一把勁，國民像國民一樣忍耐，軍人像軍人一樣奮發的話，



(圖四：群馬縣警部長報告小山情況的電報)

10) 永岡栄吉《緑と黄の対角線——下関講和會議始末——》下関郷土會編 1965年第89頁

11) 注：日本員警的最低級別，也泛指員警

12) 注：指進城的鄉下人

13) 《東京朝日新聞》1895年3月26日

14) 注：日語“壯士”指充當幫間的無業遊民，當時常被各政治團體用作打手

連戰連勝的結果是指日可待的。一路追擊毫無骨氣的支那兵，鐵鞭遙遙北指，用不了吹灰之力。用不了半年，就能讓四億支那人在北京城的日章旗之下跪倒了。而李鴻章是外人，不如幹掉他。這就是我決意為此凶行的目的。結果與預期相反，成了多此一舉，和目的完全背道而馳。”¹⁵⁾

正如小山所說，這次刺殺的結果與初衷“完全背道而馳”。按照國際法，外交使節的人身安全應受所在國保護，這使得日本政府如坐針氈。

2.3 為李鴻章醫治而被授予雙龍寶星的石黑忠憲

然而，面對這場突發事件，日方的對策很迅速也很周全：

首先是治傷。為給李鴻章治療傷口，伊藤博文致函廣島的川上操六參謀次長“李鴻章狙撃され、傷の深淺は分らぬ。直ぐ石黒佐藤を差越されよ。”¹⁶⁾。李鴻章本來帶來了兩名醫生，即北洋西醫學堂總辦林聯輝與法國駐華公使館醫生德巴斯（Depasse）博士。而為了爭取主動，日方決計擠開兩人，將治療權抓在自己手裏。

“私は申した。此の電報では、李氏の傷かどの程度のものか解りません。聞く處では李氏は其侍醫林某と、佛國公使館附醫官某を連れて参つたさうである。されば此變に際し、此の二人の侍醫を押退けて、私共の手で治療をするといふ事は甚だ困難と思はれる、往年露國皇太子大津の變の際にも、其侍醫の手で治療を行ひ、我國の醫師に診せなかつたのですから、今回もそんな事ではないかと案じられます。併し伊藤總理の招電がある以上、行かざばなりませんまい”¹⁷⁾

在收到電報之後其夜，石黑忠憲與佐藤進從廣島出發，於第二天早八點四十分到達下關¹⁸⁾。看到清國的兩艘船在吐著黑煙，猜測到李鴻章是要有回國的準備。在與伊藤博文會面後

“外務大臣を訪うた處、頗る憂色を浮べて申されるには、今談判がやゝ緒に就いた處へ、此の兇變で全く困った。若し李伯死すれば勿論然らずとも歸國すると容易ならぬ次第で頗る困る。外交上李伯を飽迄此地に引留めねばならぬ。私も左様に思ふが引留は中々困難です、併し何か工夫がありさうに思ひます。精々努力します”¹⁹⁾

隨後，在見到李經方後為擠開林聯輝與法國駐華公使館醫生德巴斯（Depasse），李石黑忠憲對李勸說如下：

15) 吉辰《昂貴的和平：中日馬關議和研究》附錄三 三聯書店 2014年版第343-344頁

16) 石黑忠憲《石黑忠憲 懷舊九十年》大空社 第295頁

17) 石黑忠憲《石黑忠憲 懷舊九十年》大空社 第296頁

18) 石黑忠憲《石黑忠憲 懷舊九十年》大空社 第297頁

19) 石黑忠憲《石黑忠憲 懷舊九十年》大空社 第297頁

“我が陸軍の精製せる繃帯材料を使用せられたるさうである、其の爲、受けられる創傷は危険部なるに拘らず、未だ悪症候なき趣なるは、最も慶賀する處であります、余不敏なれど多年軍醫として銃砲創治療の経験を積み、自ら信する處もあり、又外科に於ては、我邦第一と稱せらるゝ佐藤軍醫總監が特派せられた故希くは兩侍醫の承諾を得て其創所を檢診し、其の詳細を我が天皇陛下に奏聞する事を得しおられ度いと申入れました。”²⁰⁾

在李經方向李鴻章彙報且得到李鴻章同意後，回復石黑忠惠：

“伯に貴君等の御來旨を告げた處、伯は深く貴國陛下の厚恩を感謝致しました、兩侍醫をして貴下等に創所の詳細を述べしめ、且つ繃帯交換に際して創所を一見せられん事を乞ふ旨を申して居ります。”²¹⁾

而石黑對於這番見面的回憶具有詳細的心裏描寫：

“此度我が天皇陛下が此の大役を外科の權威者たる佐藤氏一人に負はしめずして、私にも責任の一半を負はしめ給うたといふ事に付いては、此の役目は治療家のみでは果し得ない、其の治療術を施すに至る迄の交渉が大切である事を思召されて、其の役目を私に命じ給うたものと私は考へたので深く心を決め、李伯をして私共に信頼するの念を起させる迄の骨折りは容易な事でないけれども是非完うせねばならぬ、と臍を固めました。”

可以看出石黑忠惠對於李鴻章一直是抱有一種必得的心態，也是這一番心態為清國及李鴻章對石黑忠惠的授勳與感謝埋下了伏筆。

在石黑忠惠為李鴻章檢驗病情時，發現子彈打入了左眼的下一寸的位置，周圍有不規則橢圓形的傷口，並且左臉頰呈現紫紅色，已然紅腫，眼瞼也有浮腫且呈現淡紫色狀態。眼睛也完全睜不開。

“其時林侍醫が創所を指して、銃丸の入つた方向を示します。銃丸を撃込まれた左眼下一寸の處に、周縁不齊橢圓形の銃創口があり、創唇は紫紅色を呈して居ますが、不良のさまもなく、眼瞼は腫脹して淡紫色を呈し、眼は閉じて開かれません。”²²⁾

而對於日方派來的醫師，初期李鴻章也並不信任，並隨口試探：

“銃丸の所在は何れの方向と認められますか。”

20) 石黑忠惠《石黑忠惠 懷舊九十年》 大空社 第296頁

21) 石黑忠惠《石黑忠惠 懷舊九十年》 大空社 第298頁

22) 石黑忠惠《石黑忠惠 懷舊九十年》 大空社 第299頁

“此の如き銃創を實驗した事がありますか。”

“此の種の銃創で生命を失つた者がありますか。”

而對於李鴻章的質問與懷疑，石黑忠憲一邊安撫李鴻章的情緒，一邊自信的解釋著：

“此の創の如きは治療が法に合はば敢て危険といふ事もありますまい。銃創の治、不治は最初其の措置宜しきを得、加ふるに精良なる消毒繃帶材料を我陸軍病院から古 宇田軍醫が持って馳け付けて御世話したとの事故、十の七八は其の経過必ず良好なるべきを豫言致します。”²³⁾

並且對於手術中出血過多，李鴻章大發雷霆，而石黑忠憲為安撫李鴻章的情緒，很誠懇的說李伯如我父。會像對待父親一樣醫療，從而李鴻章態度軟化，也積極配合醫療。

而對於能否摘除子彈碎片，是否使用麻藥一事上，石黑忠憲與佐藤進產生了分歧。佐藤進認為若要摘取子彈碎片必須使用麻藥進行麻醉，但是石黑忠憲認為，李鴻章已七十四歲的高齡，身體肥滿，心臟有脂肪化。比較危險。並且重要的是這次治療也關乎國際關係的變化。不可出漏失錯。

“今日の事は單に治療のみではなく、一方には國際的の大關係がある。先づ急なるは此患者の治療を我手に收むる事である。彼れ李伯年已に七十四歳、其身體肥滿して、心臟に幾分脂肪化の兆がある故、コロホルムを用ひるに安心の身體とは思へない。麻醉の爲に萬一の事あらば、其關係する處は我等二人の粗漏失錯に止らぬ。”²⁴⁾

並且為了保持李鴻章在日本繼續談判，不喪失此時談判良機，石黑忠憲告誡李鴻章說：

“凡そ外傷 治法は心を安泰にして過勞せず、身體を安靜に保って動かぬ事を肝要とします。経過良好の銃創患者が、航送の際船中にて動搖の爲に症狀悪化するは、毎々見る處です、況してや伯の老體をや、病床にある間は、爰に心を用ひられ度い、食餌は嫌忌するものはない、其の好む處を取られてよろしい、唯だ過脂の品は避けられ度い。”

對於此次對話，在石黑忠憲在回住處時，順訪了陸奧外務大臣：

“私は辭して宿屋に歸る途中陸奧外務大臣の寓に寄り、李伯の治療を全く我手に收めた事、そして其の歸國の念を絶たしめた事、又佐藤氏の技術を李伯に確信せしめ得 た事を報告しますと、陸奧伯は喜色を浮べて、御苦勞を多謝する。”

23) 石黑忠憲《石黑忠憲 懷舊九十年》大空社 第300頁

24) 石黑忠憲《石黑忠憲 懷舊九十年》大空社 第302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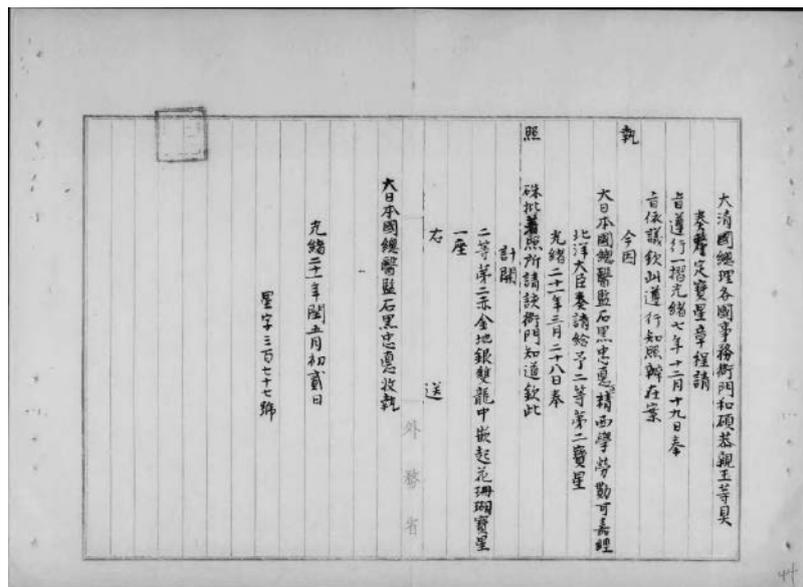
可見在石黑阻止了李鴻章歸國的念頭且完全壟斷了對李鴻章治療一事，外務省是喜出望外的。石黑忠意在治療李鴻章一事，一半是人道主義的醫療，而另一半也關係到外交層面。不僅要對清政府及李鴻章本人進行安撫，對俄、英等國有所表態，也要對日本國外務省有所交代。

治療十幾天後，傷口已完全癒合。但由於李鴻章年高體衰，不宜開刀，這顆子彈就此一直留在他的血肉中，直到蓋棺。

其次是慰問。事件之後，李鴻章的病榻前走馬燈似地穿梭著前來慰問的日方官員，“寢室前後甬道遊廊皆滿”。天皇與皇后也作出了表示：天皇派侍從武官中村覺大佐為特使，前來馬關慰問。皇后也手制繡帶，並遣來兩名護士。《朝日新聞》等三十家日本報紙一同送上六十只雞，請李鴻章“為兩國加餐”。而馬關市西部漁業組合送來的東西就更有創意一些：一只特大號水族缸，裝著章魚、海參等七十多種海洋生物。

自然還有懲凶。在政治需要下，對這個案件可以說是特案特辦，審判非常快捷。第二天即進行初審，認定案件適用日本刑法第 292、112及 113條，即故意殺人未遂。3月30日，案件移交山口地方裁判所正式審理，判處小山無期徒刑。

因為對李鴻章進行了周全細緻的治療。李鴻章在歸國後，上奏獎賞石黑忠惠及佐藤進。光緒二十一年，因“精西學，勞勳可嘉”²⁵⁾ 賞賜石黑忠惠二等第二赤金地銀中嵌珊瑚寶星。



(圖五：清國授勳石黑忠惠雙龍寶星的執照)

“今嫌和條約は交換濟になつたとはいふものゝ、私は未だ戎衣も解かぬ征途に在つて、敵國の贈物を其儘受くる事は如何と思はれるから、其箱は一旦京都の大本營へ御廻し願ひ、後日事全く平らぎて、大本營からお渡し下さる様願ひ度い、と申したので、 辦理大臣は、其儘其箱を内地に持歸られました。其中五月十七日征清大總督宮には旅順を出發凱旋となり、私も隨行して五月二十二日京都へ着き、同月二十五日に大本營で私は清國皇帝からの贈物を受取りました。開いて見ると清國皇帝より、

25) アジア歴史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A10112446900

第二等雙龍寶星（勳章）を私と佐藤氏に、又李中堂よりは、私へ琥珀臥牛一、白玉の肉池二と織物一箱、佐藤氏へは玉香箱一、玉碗二、織物一箱を贈られたのです。未だ媾和手続きも完了せぬ内に、勳章を贈るとは、誠に機敏なことであり、又戦時には国際法上局外中立たる軍醫の職務に在つて勳章を受けたといふは、軍醫歴史上特普すべき出来事と思ひます。”²⁶⁾

在石黑忠惠的回憶錄里清晰地記載了清國皇帝因為石黑忠惠為積極且妙手的治愈了高齡的李鴻章，不僅授予了石黑忠惠二等第二雙龍寶星並且李鴻章私人還贈送了琥珀臥牛一隻，玉碗兩隻還有織物一箱。

並且如上圖執照中記載的清國在光緒二十五年三月授予石黑氏的寶星，按但是石黑氏考慮到自己戎裝未解，仍在征戰途中，敵國（清國）送來的物品不知該如何是好，所以先將物品遣送到了京都大本營。事後待媾和條約交換完且局面稍微平定，直到兩個月後的五月二十五日，才接受了清國的雙龍寶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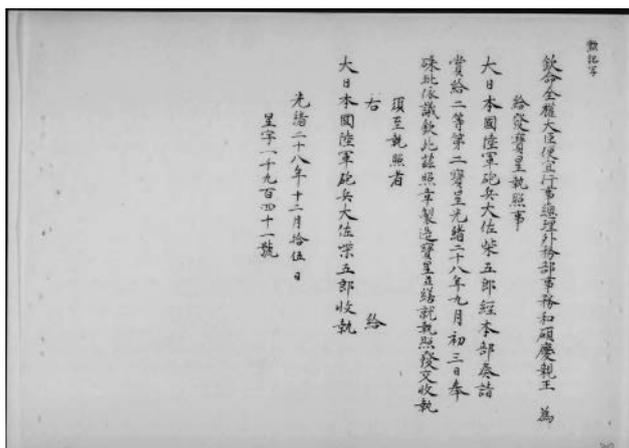
對於清國授予日本人石黑氏雙龍寶星一事，一是李鴻章位居顯赫在清國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二是李鴻章年事已高，身體衰弱治療槍傷是相當困難，但是經過石黑氏的精湛治療，李鴻章得以痊愈。三是石黑忠惠位居的職位符合《雙龍寶星章程》的基準。故而授予了石黑氏二等第二雙龍寶星。

其實在媾和手續沒有完全結束之時，授予石黑氏寶星一事，是非常機敏的時期。並且在日清對立之時，在國際法上屬於中立的軍醫，被授予勳章，也是軍醫歷史上應該記載的一筆。

三、1902年獲二等第二雙龍寶星的柴五郎

3.1 “北京籠城事件”的起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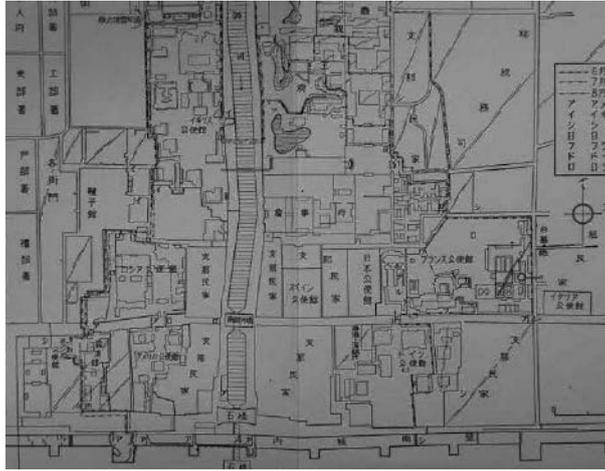
在清國對日本人授予寶星的史實中，還有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柴五郎。柴五郎於光緒二十八年被清國授予二等第二寶星，正是北清事件發生后，光緒二十七年《辛丑條約》簽訂后。而柴五郎又是因為什麼原因被清國授予了雙龍寶星呢？



（圖六：清國授勳柴五郎雙龍寶星的執照）

26) 石黑忠惠《石黑忠惠 怀旧九十年》大空社 第330頁

1900年義和團戰爭時期，柴五郎任日本駐北京公使館武官，在清軍、義和團 50天的包圍中負責指揮日軍作戰。他是明治時期日本的代表人物。又是一個極有才幹的中國通，後晉升為大將。義和團戰爭前，他接受日本參謀本部的命令，在中國和朝鮮從事情報活動，1887年他會同福島安正花了半年時間走遍北京城內外。繪製了北京地區詳圖。²⁷⁾



(圖七：柴五郎繪製的北京地區詳圖)

1900年6月-8月發生於北京的圍攻使館之役是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進攻北京時期震動中外的事件。圍攻使館之役的各項重要戰鬥是其重要內容之一，其中，柴五郎保衛各國使館，是肅王府防線的戰鬥是重中之重。肅王府之戰，守方是以柴五郎領導的日本使館衛隊為主力進行的。

3.2 巷戰的衝突過程——以《北京籠城》回憶錄為中心

據柴五郎記載：“6月21日，隨著清軍大規模進攻的開始，”肅王先已率領其府中人，避往皇城”，肅王府“今已成為眾人避難之地”，旋即為日本使館衛隊據為北部防禦區”²⁸⁾。在庚子圍攻使館初期，清軍曾猛烈進攻使館區北部防線西段和西部防線，直接壓迫英國使館。“清軍對英使館進攻較少並非由於地理條件的限制‘無法進攻’，而是出於有意控制”，“清政府的目的並不是真要‘夷平使館’，而是要通過攻打使館使外國使節處於‘准人質’的危險境地，迫使其同意停戰議和”的分析。²⁹⁾日本駐清公使西德二郎給外務省的報告也證明了這一點：當初各國領事議定，除比利時公使館和6月21日、22日被大火燒盡後的荷蘭公使館不再防禦外，在防禦區內，一旦各方難以支撐，奧國使館人員先撤退至法國使館。若再難以支撐，則奧、法、德三國使館人員與日本使館人員在肅王府內會合。如果依然難以支撐，最終退往英國使館，美、俄使館難以支撐時，亦退往英使館，故英國使館乃是最後之退守地。他並稱：“我兵遂佔領肅親王府作為我據守之陣地。一則幸虧我公使館位置介於美、俄、德、法、英之間，唯東北之一角以當清軍，後面即法、英使

27) 小林一美〈柴五郎對侵華戰爭的看法〉山東社會科學 1991年第10頁

28) (日)柴五郎《北京籠城》平凡社 1965年第10頁

29) 林華國《義和團史事考》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3年第118-121頁

館間之一角，最初由我方負責守衛。一則肅親王府之位置與上述負責地段接近，地勢最高，是附近區域最高的一個制高點，可以俯瞰我方最後的退守地英國公使館。此地若被清軍佔領，英國公使館即陷於危險境地。故肅親王府乃為重要之戰略要地。”³⁰⁾對於肅王府的重要地位，日本前敵指揮柴五郎也補充說：“肅王府就像圖上所看到的那樣，遮擋著英國公使館的一面，且地勢較英國公使館略高，從府中之假山和牆上可對英使館居高臨下射擊。此時河中幾乎無水，對英使館而言，乃極為險要之地。且肅王府也是意、法、德等諸公使館與英公使館聯絡的交通要道。基於肅王府的重要性，英國公使才做出了以上之考慮。”³¹⁾

西德二郎公使的報告中說，此次戰鬥最初由“清國以驍勇著稱”的董福樣部四五千人專門擔任，榮祿軍輔助，6月23日起董軍一部參與阻擊大沽口登陸的八國援軍，故由武衛中軍將圍攻的兵力補足，至8月上旬，“或雲上述軍隊由八旗兵所代，或傳由山西、陝西等地之駐防軍所接替”。概言之，清軍進攻使館區的攻勢最盛時，直接投人的兵力不少於七千人，最多時達到1萬餘人。³²⁾

為了保護使館，從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1900年5月31日）開始，列強各國從天津調派軍隊，以使館衛隊名義進京。從使館方面的記載可知，各國軍隊是陸續調進北京的，又由於有使館人員、中國教民隨時補充參加義勇兵，各國記載使館衛隊的具體數目統計略有出入，但基本可以確定在530人左右（含義勇兵）。³³⁾

據肅王府前線總指揮柴五郎記載：“20日下午三時半左右，一直相安無事的中國官兵開始射擊，清軍最初向奧國使館射擊，隨後又對英、意使館射擊，奧兵抵擋不住，棄其使館，從王府大街與長安街相交的十字路口的哨所撤離，退到總稅務司一線，先前派往比利時使館的八名奧兵也撤了下來，於是，比利時使館當夜被清軍焚毀。奧國使館衛隊當天就主動放棄自己的防線，退到法國使館。”西德二郎的報告也說：“至6月21日，由於昨日以來清兵進攻猛烈，奧國兵撤退與法國兵會合。”使館衛隊的集中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法國使館的防禦力量，因此後來法使館的戰鬥也異常激烈。同時，北禦河橋上的英軍哨所抵擋不住撤了下來，退守到英使館前沿堡壘裏。這樣，日本兵負責的區域，即肅王府的北方，完全暴露在清軍面前，肅王府之戰正式拉開帷幕，是夜各方槍聲不絕。³⁴⁾6月21日，清廷下令開戰，清軍圍攻使館之戰全面展開，發起了如暴風驟雨般的攻擊。上午，清軍一部首先突入位於奧國使館之西、稅關之北的堂子，向奧使館猛烈射擊，隨即施展火攻，大火吞噬了奧使館，火勢蔓延到海關及中華銀行。另一部清軍從王府大街方面朝奧、法兵負責守護的台基廠哨所（位於法國使館東北部）猛烈射擊，並從使館東面向義大利使館前哨所射擊。更令使館方“意想不到的，清軍竟從英使館西面的皇宮建築物儀鸞衛向英使館射擊，俄清銀行西側的荷蘭使館亦被燒毀”。南面的進攻更為猛烈，據柴五郎記載，清軍將兩門發射75毫米克魯勃榴霰彈的大炮擺在正陽門上，終日向諸公使館內轟擊，“炮彈彈片和塵土向使館守軍劈頭蓋臉地落下”。清軍進攻的方位和激烈程度出乎使館方意料，清軍在各方面戰線的射擊終夜未絕。³⁵⁾

30) 《駐清公使西德二郎致青木外務大臣之報告書》第七一七號 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冊一 東京 日本國際連合協會昭和三十一年第724-725頁

31) 柴五郎《北京籠城》平凡社 1965年第19-22頁

32) 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 別冊一 第723頁 柴五郎《北京籠城》第43-4頁

33) 柴五郎《北京籠城》第8-9頁 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 別冊一第723頁

34) 柴五郎《北京籠城》第18頁 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 別冊一 第724-725頁

35) 柴五郎《北京籠城》平凡社 1965年第18-19頁

日軍的戰鬥效率，也得益於被救安頓在肅王府內的 3000名男女教民組成的義勇隊與日本兵並肩作戰。³⁶⁾ 為了加強肅王府前線的戰鬥力，“日本分到了繳獲來的 8 支步槍，於是日本義勇隊員能和陸戰隊一樣執行戰鬥任務。守衛在日本使館的日本義勇隊轉移到肅王府，日本公使館則讓清國教民守護。”³⁷⁾

由於慈禧太后的懿旨，6月25日下午清軍暫時停火。原因固然多端，但顯然與此日兩廣總督李鴻章報告英、日政府意向，力請“保住使館，尚可徐圖挽回。否則，大局不堪設想”的電奏有密切關係。這道電奏顯然對慈禧有所影響，她在當天發給李鴻章、李秉衡、劉坤一、張之洞等的電旨中稱：“此次之變，事機雜出，均非意料所及，朝廷慎重邦交，從不肯輕於開釁……卻非釁自我開。現在兵民交憤，在京各使館勢甚危迫，我仍盡力保護。”³⁸⁾ 這也顯示出慈禧對朝局的控制力。

由於清軍將此前進攻肅王府的大部分兵力和大炮移去進攻德、法使館，因此，幾乎整個7月1日上午肅王府方面十分平靜。然而，這種平靜在中午時分被徹底打破。12時左右，榮祿指揮的大批清軍再次向肅王府東北隅逼來，並在離肅王府東北角 200米左右的地方，以兩門大炮狂轟觀音堂為中心的地區，日軍幾乎支持不住。7月2日，清廷注目的焦點在天津，在北京仍按慣例進攻。自早晨起，肅王府觀音堂和回樓即遭到清軍兩門大炮的狂轟。柴五郎還記述，大隊清兵自靈殿廢墟湧入，逼近並欲從檜林北牆及東門附近的牆上向日兵俯射，但遭到安藤大尉和守田大尉部的頑強抵抗。下午1時，日軍堅守不住，不得已而退。清軍隨即掩至，日軍努力維持的檜林一角陣地被迫放棄。與此同時，清兵偷偷靠近觀音堂並放火，使館方只能放棄第一道防線而退守第二道防線，東北方面日軍退守假山北牆，西北方面義大利軍也不能據守回樓廢墟，退守池西之北山。肅王府守軍的地盤被大大縮小，士氣大受影響。柴五郎認為，日軍在此次作戰中死傷慘重，“此乃開戰以來最艱苦的戰鬥，士氣極為沮喪，我也認為，像這樣每天被進攻，終究不能固守”。³⁹⁾

在肅王府東面防線附近，法國使館已殘毀，清軍愈逼愈近，進入拉鋸戰狀態。與此同時，美軍防線恐不守。法、美使館防線的危機，必然影響到肅王府防線的安全。不得已，柴五郎將肅王府可能無法守住的憂慮告訴了英、法公使，於是英國公使館內開始修築巨大的工事，準備一旦肅王府被清軍攻陷時，做最後的防守之用。⁴⁰⁾

這場戰鬥到7月6日持續進行。上午8時，清軍用2門大炮猛轟肅王府假山東凸角，轟開一大破洞後，欲從此攻入，日軍集中火力向破洞射擊，清兵不得已而退。11時，清兵將1門大炮運到破洞口，欲往裏射擊，遭到守軍猛擊，丟棄大炮而退。在意軍火力掩護下，日本兵、教民隊、英國兵從破洞沖出欲奪大炮，為清兵猛烈射擊所阻，安藤大尉重傷死去。下午5時，清兵將破口堵上，將大炮移往別處。⁴¹⁾

10日，清軍火炮的攻擊：“其炮有九尊或十尊，中國軍中之炮，必不止此，其餘想運往天津矣。即此九尊或十尊之炮，若一齊施放，其勢已甚難當。有二尊在宮牆之上，有時齊放，有時或斷或續，參差不齊，如果接連齊放，至二十四點鐘之久者，則英使館難以守矣。又有二三尊在內城之上，有三四尊對於肅王

36) 同上 第24-25頁

37) 柴五郎《北京籠城》平凡社 1965年第27-28頁

38)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 第186-187頁

39) 同上 第43-14頁

40) 柴五郎《北京籠城》平凡社 1965年版第44頁

41) 同上 第52-54頁

府及法使館，其餘則巡歷各處，伺隙而放。幸而中國兵隊不明施放之術，其彈或為炸裂之彈，或為生鏽之圓彈。有數日忽然靜寂，有時忽然大為活動，只數分鐘之間，其摧毀之力，視數禮拜之槍為巨。然予等不能怨之，因有許多之房屋樹木，並各種阻礙之物，使敵人觀察不明。⁴²⁾

7月13日凌晨，各國侵略軍按計畫向天津城發起總攻。消息傳到北京，一方面引起朝內傾軋，主張保護洋人的立山等人被查辦，另一方面就是慈禧震怒之下，命清軍力攻使館。

7月14日，天津失陷。清軍經過近一月的進攻，很清楚肅王府日軍防線是一塊硬骨頭，故暫時轉移進攻重點，猛攻法使館。柴五郎記載，清兵除向防線的意軍哨所、停山炮擊外，肅王府大致比較平靜。⁴³⁾

7月16日晨起，由於清廷有休戰之議，慶親王奕劻派使者向英國公使遞交休戰提案，清軍也暫停攻擊。但短暫的休戰很快過去，就在這天上午，英國指揮官斯德拉茲海軍大尉、柴五郎中佐、莫裏遜博士巡視哨兵線，在回來的路上，於停山西山腳下被阻擊，斯德拉茲大尉身負重傷，當夜死亡，莫裏遜博士也負了傷，柴中佐軍服左袖被子彈打穿，但未傷及身體。⁴⁴⁾

7月17日，清廷發佈“誼重邦交”，“保護使館”、“各直省保護傳教士”、保護洋商，“相機剿辦”“土匪亂民”的上諭⁴⁵⁾，清軍隨即停止進攻。柴五郎稱：“自上午十時起……進入了實質上的休戰。”⁴⁶⁾

肅王府防線的日本衛隊及聯軍利用這難得而短暫的休戰期間，主要做了如下諸事：

首先，繼續加固整修肅王府防線，並千方百計補充槍彈。8月1日，日軍增築了東阿司門哨所。3日，日軍從清國苦力那裏買到雷明頓槍1支，子彈55發。4—5日，日兵從清國苦力那裏又買到400發子彈。⁴⁷⁾這是清軍官兵發戰爭財的一種表現。

第二，補充食品。食品奇缺實際上是被圍攻的整個使館區都面臨的問題。在肅王府防線，從7月18日至21日，一些清軍士兵悄悄地拿著砂糖、豬羊肉、雞蛋、蔬菜、水果到哨兵線及東阿司門的哨所附近販賣，日軍得以補充飲食，並分出一些給英國使館及傷患。但到8月1日，日本兵的口糧不夠支持一周，又從英使館分到麵粉。8月3日，各國公使開會決定，將僅存食糧節約使用，平均發放。⁴⁸⁾

第三，加強對清方的情報搜集，清軍也趁機提供假情報進行干擾。7月18日，日方命令北京同文館教習杉幾太郎專門從事課報工作。21—26日，杉幾太郎等從清兵、清人間諜那裏得到種種情報，包括各國援軍進軍、包圍使館清軍的配備等情報，但其內容真偽難辨。28日收到天津英國領事給英國公使的密信，判明清人間諜情報的虛偽性。⁴⁹⁾

在休戰中，清方和使館方沒有明槍卻有暗箭，雙方還展開了虛虛實實的外交戰。清總理衙門多次催促英國公使提交從北京撤離的日期，並向各國抗議使用中國教民作戰。各國公使則向總理衙門抗議清軍違反

42) 柴五郎《北京籠城》第58-59頁 樸笛南姆威爾《庚子使館被困記》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義和團》(二)第282頁

43) 柴五郎《北京籠城》平凡社1965年版第63頁

44) 同上 第65-67頁

45)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 第328頁

46) 柴五郎《北京籠城》平凡社1965年第51頁

47) 同上 第67-68、70-79、81-88頁

48) 同上 第68-72、81-87頁

49) 同上 第68-88頁

停戰協定。雙方又不斷尋求解決辦法。清政府更是做出姿態，7月20日，慈禧太后送來蔬菜、水果，慰問各國公使。26日，總理衙門又給使館送來蔬菜、雞蛋和麵粉，以表慈禧太后慰問各國公使之情。⁵⁰⁾

8月14日凌晨，八國聯軍發起對北京城的總攻。

柴五郎記述：凌晨2時左右，從東邊傳來的逼近北京的聯軍槍炮聲越來越清晰，而清軍的攻擊也越來越猛，尤其是肅王府一帶的日軍防線，受到的攻擊壓力很大，傷亡不斷增加。從上午11時開始，清軍將兵力向東方轉移，欲扼制聯軍進攻，對使館區、肅王府的攻勢才漸漸衰減。下午3時左右，英軍之印度兵從禦水河門沖入公使館防禦線內。日軍福島少將率領步兵第十一聯隊，於下午8時40分到達日本公使館。同夜，北京城幾乎全部陷落。⁵¹⁾

慈禧發動圍攻使館的政治考慮確實是“以戰逼和”，這顯然是使館久攻不下的一個重要原因。攻佔肅王府是既定方針，也是實現慈禧政治意圖的重要環節。但是，戰場形勢不可能絕對按照單方面的“意圖”進行，隨時可能出現“意外”。肅王府之戰，清軍進攻是很猛烈的，然久攻不下，除了慈禧的政治意圖制約清軍的進攻路線圖外，重要因素還有清軍的戰術訓練差、軍事素養差。

3.3 授予柴五郎雙龍寶星的前後

1900年8月14日，由山口素臣中將率領的日軍第五師團從東直門、朝陽門一帶攻入北京。數日後，各列強開始對京師劃分區域，分地而治。日軍因為入城較早，所佔據的北城，地面廣闊，宮殿星羅棋佈。日軍較早設立了所謂安民公所。日軍警務長《安民告示》稱：“東自東四牌樓以北，西自北堂後身，直至阜成門城根以北，為大日本帝國所管轄。爾等良民，務宜各安本業，不可驚惶倘若無故驚惶，紛紛奔竄，恐反不能分別良莠，自取橫禍也。如有不法匪徒，身藏兵器者，一經查出，即照軍法懲治，勿謂言之不預也。”發佈者署名柴，即柴五郎，是日本陸軍最早的中國通。柴五郎長期住北京，對使館的兵力指揮得當，事後得到了各國政府頒發的勳章。

列強入侵京師，德國佔領區情況最糟，“性情暴惡，專以殺人為能事”。相對來說，“日本最安謐”，在進入紫禁城后，柴五郎下令部下緊鎖東宮女眷，勿讓遭受無禮之對待，且保守國璽。在京中維持秩序，安保民商。組織遠比他國嚴謹。

1902年1月16日，出使日本大臣蔡鈞向日本外務省呈遞照會，轉達慈禧太后懿旨，內稱：“上年拳匪變亂，禁門以內，日本兵官嚴飭弁兵，極力保護，……深宮甚為感悅。著蔡鈞轉達日廷外部，傳旨向日皇伸謝，並著查取兵官武弁職務，迅速電複，以便分割等第，賞給寶星。”⁵²⁾略言之，就是要蔡鈞找日本方面索取上一年作戰的日軍軍官名單，以便清廷向他們頒賜“寶星”予以嘉獎。

另據慶親王奕劻致日本外務大臣信函，早在1901年上半年，清廷已主動向日方提出獎賞參與籠城之役的日軍將官，但日方“師團長來函謙謝，而未將各官銜名開送”。日軍未作回復。故該年冬，奕劻再次請求日本外務大臣向清廷提供將官名單，以便“奏請皇上，分別給寶星”。⁵³⁾

50) 同上 第71、75-76頁

51) 柴五郎《北京籠城》平凡社 1965年第93-101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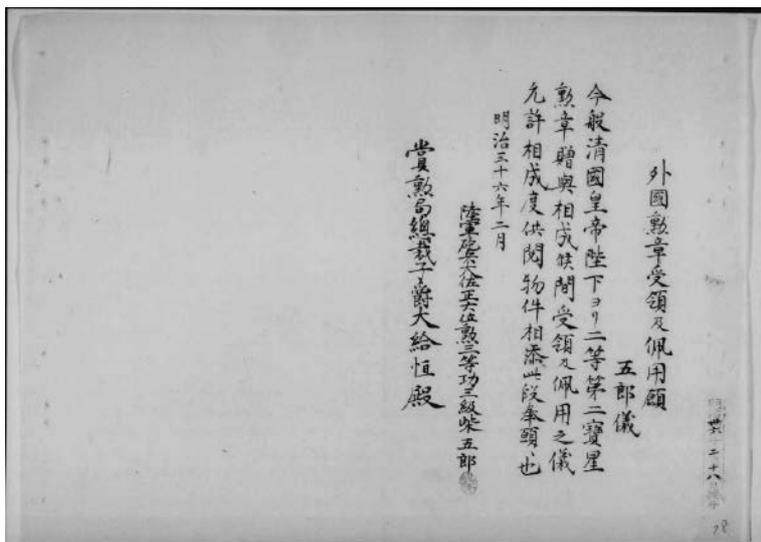
52)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國政府授勳》6-2-1之二

53) 同上

日軍“禁門以內，日本兵官嚴飭弁兵，極力保護”，確實有史料可證。時人日記，多有關於日軍紀律和日占區秩序在聯軍中為最佳的記載。在京的英國人赫德也評價稱“日本軍隊對於維持秩序、組織供應等等遠比其他各國領先”……⁵⁴⁾

另據日軍參謀本部檔披露，北京城被攻陷後，城內大亂，有滯留城中的清廷官員前往日本公使館求助：“有清人攜帶日本國旗，冒死來到公使館內的第五師團司令部，請求面見福島少將。此人是漢軍正白旗的參領，與少將相識已二十餘年，名為申烏珍，……少將囑咐烏珍，讓其尋找城內朝中大員，並讓其轉達如下之言：火速迎接慶親王，並打開同各國使臣的交涉之途，否則以今日之狀況曠日持久，則北京終將化為一片焦土。烏珍深領其意……”⁵⁵⁾ 宮中滯留的嬪妃、太監、宮女、守兵等，能夠在大亂下活命，也與日軍有關。據吏部主事胡思敬記載：“日本初入城，即分兵防守宮禁，宮中死亡逃逸外，食指尚千人，皆日軍供給之。太后出巡時，珍妃死，瑾妃從，唯惠妃留宮。惠妃者，穆宗妃也。素饒機智，太后甚重之。時宮人無所稟承，共推妃為主妃，保守國璽，約束閹官，並遣使致謝日將柴五郎，措置皆有法度。”⁵⁶⁾ 日軍當日駐守東華、神武、西華三門，確實曾放出“如同乞食”的禁軍、宦官等二百餘人。

1899年，慶親王奕劻曾得慈禧許可，派人攜帶珍貴禮物及密電碼本赴日，策劃過一次“中日結盟”。日方收下了禮物和密電碼本，但對結盟一事態度模糊，既未拒絕，也未回應。庚子年日軍的上述“善意”，顯然讓奕劻再度看到了“中日結盟”的希望，故而又是在他的主導下為日方授勳。⁵⁷⁾



(圖八：明治政府的允許佩戴外國勳章願書)

根據柴晚年所寫的遺文，其故國會津藩在明治維新時遭官軍的洗劫，柴五郎的祖母、母親、嫂、姐、妹等五人在官軍的暴戾中自戕而死。他少年時期即失去親人，遭遇坎坷，很長時間流浪他鄉。後來在他人

54) 戴海斌 《“無主之國”：庚子北京城陷後的失序與重建——以京官動向為中心》《清史研究》2016年第2期

55) 《明治三十三年清國事變戰史》《義和團運動文獻資料彙編·日譯文卷》第355頁。轉引自：戴海斌《“無主之國”：庚子北京城陷後的失序與重建——以京官動向為中心》

56) 胡思敬《驢背集》《叢刊·義和團》第2冊 第516頁

57) 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為人知的中日結盟及其他——晚清中日關係史新探》巴蜀書社 2004年第123-124頁

幫助下入了陸軍幼學校和陸軍士官學校，雖然他身為明治政府的軍官，但是由於他故國和親人的遭遇。又使他憎恨薩長勢力。這使柴五郎精神世界十分矛盾。

他晚年曾說：“日本人是自負和輕率的，中國人則不同，一旦得到他的信任，他將始終以誠相待。在被圍困期間他們曾冒生命危險為我們送來糧食，多次為我們與天津的日軍取得聯繫。”關於日中戰爭。他晚年曾說：“中國決不是能用武力征服的國家。這次戰爭遺憾地遭到敗北。中國人尊重信用和麵子。但是中略日本卻多次背叛了他們的信用，也玷污了面子。因此，只在口頭上高喊建設大東亞共榮圈，他們是不會回應的。⁵⁸⁾

結語

清廷對於寶星勳章制度一直以來作為禮儀制度的輔助而加以改變和運用。最初並沒有認識到勳章的外交禮節作用及國際社會的通行標準。隨著與外國人深入的接觸及頻繁的與國際社會聯繫之後，才認識到寶星勳章作為一種制度的重要性。由此《寶星勳章制度》應運而生。清末，清國人漸漸認識到西歐列國的實力強盛之後，依然作為一種天朝上國的身份自居，甚至在以禮節性為前提對外授予的“雙龍寶星”上印有“大清禦賜”四字。或多或少反映出清廷對自我身份的認同與無奈。

勳章制度最早原始於西歐。最初是為獎賞具有卓絕戰功的重要人物。被授予者會有一種榮譽感和成就感，是對功勳者功績的認可；而授予者可以彰顯權力、地位與正統性。敘勳不僅具是褒獎、激勵的作用，也具有國家意義。對於東亞來說，勳章可以說是“西學東漸”的產物。賞與罰一直是維持東亞國家社會生活的兩大支柱。而在西學東漸的背景下，清國人在接觸西歐文化的同時，原有的封賞制度在悄然聲息的發生著變化，隨即清國產生了寶星章程。

本文也是追溯清國勳章的起源到形成，並且挖掘日本國重要的歷史人物被授予勳章背後的鮮為人知的經歷和過程。

比如從清國授予日本人的過程可以看出，中國對待日本由一種“輕日”到“師日”的過程。“師日”局面的出現，除了中國自我認識的轉變之外，與日本在甲午戰爭後對華政策的調整也密切相關。甲午戰爭一結束，俄、德兩國在中國就加強攻勢，力圖聯絡清王朝，以便在中國獲取更大的利益，清國內部以李鴻章為代表，後期以“聯俄”以抵禦日本的擴張的呼聲也日益高漲。文章圍繞著一個時間段就是明治時期和光緒時期的交錯期間，比如石黑忠惠的授勳是因為醫治日清戰爭後簽訂《下關條約》而遇刺的李鴻章。伴隨著日清戰爭的結束，東亞的國際關係也發生了變化，其中便有“冊封體制的崩壞”。一直以來的以清國為中心的東亞秩序發生了動搖和瓦解。石黑忠惠授勳前，以清為“宗主國”形成的權威的廣泛的東亞秩序基本是朝鮮，琉球，越南、緬甸等周邊國家向清國派遣朝貢使節而另一面清國向朝貢國派遣冊封使，是一種由朝貢和冊封為連接的秩序。但是十九世紀後期，處在秩序中心的清國接連喪失了琉球，緬甸，越南並且因為日清戰爭又進一步失去了朝鮮。石黑忠惠醫治李鴻章後簽署《下關條約》中又明確的記載了朝鮮的獨立。進一步在明治三十年成立了大韓帝國。

十九世紀末可以說清國的朝貢與冊封的關係被歐美的條約關係所漸漸取代。歷來涉及到清國對外的制

58) 石光真人《ある明治人の記録 会津人柴五郎の遺書》1971年 中央公論社 第145頁-146頁

度與態度都是喪權辱國的代名詞，認為在清國被侵略的同時還授予外邦勳章是一種諂媚與屈辱。無人書寫，也無人涉及。殊不知雖然是國與國敵對的狀態下，也有人性的真與善，美與德的存在。就如柴五郎，作為軍人是一定要服從命令雖然侵入到清國本土，但是在巷戰中為保衛各國使館而還擊清軍的分寸及佔領紫禁城后對宮闈女眷的保全，也是在戰爭的殘酷下尋求最大限度的善德。所以，在晚年時期的柴五郎也認識到戰爭對於中國的傷害，他晚年曾說：“日本人是自負和輕率的，中國人則不同，一旦得到他的信任，他將始終以誠相待。在被圍困期間他們曾冒生命危險為我們送來糧食，多次為我們與天津的日軍取得聯繫。”所以，授勳更好的詮釋了對於侵略國的人民的態度都以惡人相待，其中也有人性的光輝的存在。

